

21

为了权力



作者 辰光

“你的意思是胖一点儿你也可以接受？但是女人都喜欢长得坏坏的男人，并不是喜欢长坏了的男人啊。”

“没你这样设圈套的，胖子！”

“得嘞，我有新外号了，以后就叫我胖子吧！”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一段天各一方的恋情，而这段恋情在杨森的父母看来，则是大逆不道。按照他们的意思，女儿将来绝对不能回国，毕业后哪怕什么也不干也要呆在美国，先解决永久居留权，再解决绿卡的问题。至于终身大事，最好是能找个老外当金龟婿，最次也要钓上一个中国香港或中国台湾的帅哥。

所以，当女儿第一次探亲回国，整天和江天养厮混在一起时，杨森的父母当即强势阻拦。先是苦口婆心地规劝，进而母亲全天候陪同实施监控，最后限制杨森出门，干脆将其软禁在家，直到杨森假期结束返回美国。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强迫的，而在这些不能强迫的事情中，儿女私情又总是排在第一位。父母的强力阻挠非但没有使杨森回心转意，反而更把她推向了江天养这一边。两人只要一有时间就会泡在网络上，先前只能是文字传情，后来就开始语音聊天，最后可以随时视频。有一次，两人在视频时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恋情见证了互联网的发展。

这句话一说完，两人都沉默了。

就这样，在将近8年的时间里，杨森始终没有向美国政府提出永久居留权的申请，而江天养在拒绝了一个又一个砸向他的红绣球时，也因为过度奔波而使体重降到了70公斤。尽管如此，杨森还是喜欢叫他胖子。

直到最近一两年，见女儿说什么也不肯回心转意，并且也察觉到女儿曾经多次偷偷地跑回国内与江天养幽会，特别是当给女儿过生日时看到30根蜡烛被点亮，杨森的父母才不再干涉两人的交往，从敌视的态度转为一种默许。

“因为这个破事，我女朋友回来我都没去机场。”江天养看完短信，叹了口气。

刘东海对江天养的私生活了解不多，听江天养这么一说，他还以为江天养是离异后又找的女友，所以打趣他：“小别胜新婚啊！二房吧，哪里的？有时间带她来LX省，我陪你们好好转转。”

江天养使劲朝刘东海的胳膊捶了一下：“大哥！我和我女友可都没结过婚，你以为是你呢，在结婚和离婚方面经验颇丰！”

刘东海斜了江天养一眼，阴阳怪气地说：“哟！没瞧出来，还是个纯小伙呢。”

JY县安监局的局长孟广发并不在局里，此刻他正在几百公里之外的省城参加一个会议。那是安监系统的年会，要表彰一批全年辖区内没有重大生产事故的基层安监局局长，孟广发是这些准备接受表彰的基层领导之一。

为了这次的年会，50多岁的孟广发特地做了一套新西装，还在省城的商场里买了一条蓝色斜纹领带。他准备以这套行头为省局领导展示一个崭新的形象，同时还计划着开完年会后回到县里参加祝贺他荣升市安监局副局长的欢送会。

买完领带，孟局长特地给在县里主持工作的常务副局长范锋打了个电话，叮嘱他这次欢送会一定不要忘记邀请已经退休的前任局长参加，因为前任局长对他十分器重，所以他要好好感谢一下。接完电话的范锋把身体向椅子后背靠去，两条腿伸到办公桌上，开始盘算自己的去留问题。按照资历，他被“扶正”的可能性不大，况且他才33岁，还太年轻，要不是靠着身为县委组织部部长的老丈人，他现在恐怕还在小学当老师呢。

但是，要是不争这个位置，一直和自己唱对台戏的分管煤矿安全的副局长蔡赴涛就要“起来”了，到时候，恐怕自己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要么干脆调走算了，反正老丈人一句话，还不是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是他转念一想，自己在常务副局长的位置上已经干了5年多，要是再不“进步”一下，实在有些不甘心。

给“坏孩子”当班主任

2



作者 钟琴

我陪着小娟到了大队部。审讯进行到下半夜，我站在门外守着，能看见小娟面无表情，始终低着头一声不吭，任凭大队书记斥责。时间太晚了，书记也困了，这才放人。回去的路上，我提高声音问她：“到底是不是你拿了人家的钱？你为什么不说话？”她还是没抬头，只说了句：“我说没拿，谁能信我……”声音像风中飘着的蜘蛛丝，和着初秋的夜晚，有一种透心的凄婉。从此，一百多人的“青年点”里，只有我能跟她说出几句话。别人多不待见她，当地社员们背后指指戳戳，小娟的头更低了。后来，她被生产队惩罚式地安排到了最苦、最脏的养猪场。

小娟是最后离开“知青点”的，进厂当了工人。可是，“小偷”名声死缠着她，工厂给她安排的工种，竟然是基建盖房子的架子工——这可是现在一些进城农民工中大老爷们干的危险工作呀！终于有一天，消息传来：小娟从架子上摔下来，高位瘫痪，丧失劳动能力。又有消息传来：小娟得了乳腺癌，时间不多了。我找到了当年一起当知青的同学，大家终于良心发现了。那天，我雇了一辆大客车，拉了一车人浩浩荡荡地到了小娟的家。小娟异常激动，她语无伦次，不知所措。可我们知道，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小娟哆哆嗦嗦地，拿出她在轮椅上画的画儿让我们看。我不懂画儿，可我看到那上面浓郁的绿色和金色，就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她始终没断了对生命的追求。临终，她把坐在轮椅上织的一个天蓝色大床罩托人送给我，并在电话里说：“钟琴，我不知道怎样感谢你，你别嫌弃……”

这些刻骨铭心的往事堆积起来，不知怎么着，就在我心里播下了种子：将来我要做老师，专门教这些别人都嫌弃的“坏孩子”。

1977年10月，正在工厂干活的我得知邓小平拨乱反正、国家恢复高考制度时，把弟妹们正在用的课本抓过来，一头扑了进去。那段时间，我天天看书到凌晨，几乎不知书本之外还有别的世界。考试结束了，见到我的人都吓了一跳——原来的小胖丫头竟然瘦了近二十斤！那时，厂里的工人师傅对我很好，为了让我有充裕的时间看书，白天，他们把我锁在一间小屋里，并告诉其他人不要派活儿，也不要打扰我；考试发榜了，师傅们比我还急，几个人骑车一块儿去看榜；上学报到之前，师傅们高兴地和我一起栽了一棵槐树，算作纪念，还说：“你当老师了，我的儿子、孙子就交给你……”如今，一想起这些，我内心的激动就难以

言表。当年填报志愿也充满戏剧性。那时正赶上“伤痕文学”兴起，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横空出世。我一口气读完小说，“坏孩子”宋宝琦的形象立刻和记忆中的小津、小云等人重叠在一起，我决定报考师范，“救救孩子”！

“好为人师”的天性似乎是早就注入我的血脉里的。大学四年，我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大学毕业，我如愿以偿地当了高中教师。当了老师不久，我接手了一个谁都不要的“差生班”，那是1985年的事儿。学校文理科分班，一些成绩差的学生被单独编班。这些“差生”多是在原来的班里成绩倒数五六名的孩子。开学快两周了，这个“差生班”仍没开课，因为没人愿意教这个班。领导急着找一些老师谈话，我不知天高地厚，自告奋勇地要求当班主任。学校根本不指望这些孩子为升学率增光添彩，只要他们能顺利毕业就行。为了证明“差生”也是金子，我把家里几岁的孩子扔给母亲，自己吃、住都在学校的简易房里，陪伴学生们直到高考结束。两年后的1987年，在那个录取率极低的年代，当年的“差生班”中有三分之二的学生考上了大学。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差生”有的成了检察院的副检察长，有的成了银行的行长，有的成了知名企业的部门高管，有的身处地市政府的重要领导岗位，还有的成为“五一奖章”获得者……

副刊

电话：65233688

洛阳网 www.lycl.com.cn

洛阳人，看洛阳手机报

洛阳手机报本地新闻资讯内容丰富，总量占到了60%以上

移动用户发送短信 LYD 到 10658300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
联通用户发送短信 712 到 10655885 订阅，3元/月。不收GPRS流量费。